

田奇璈——人称“田泥盆”

◎文/李 锋



田奇璈（1899年2月13日～1975年9月15日），地质学家，地层古生物学家。湖南省张家界市人（原大庸县）。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地质部地质矿产司总工程师、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副主任兼总工程师。

20世纪50年代组织并参与中南及全国重点地区地质矿产普查；主持制定了数十种地质矿产勘探规范；审批了大量矿产储量勘探报告。作为核工业矿产资源调查领导小组成员，为中国核工业寻找急需的铀矿、稀有金属矿藏作出贡献。对中国南方晚古生代和早中生代海相地层和化石的研究，尤其对湖南泥盆系及其头足动物化石的研究最为深入系统。为地层划分对比、21个化石带的建立、古生物群分布与演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35—1939年完成了《湖南泥盆纪之腕足类》、《中国之泥盆纪》两部专著。

1954年获第三届“纪念赵亚曾先生研究补助金”；1940年获首届“丁文江先生纪念奖”。

“老院子”历经八代，不仅成为乡村民居的典范，更形成一道独有的人文风景。近300年间，老院子始终文风鼎盛，堪称群星璀璨。历代读书人中，获取功名者共43人，其中，翰林院学士9人、北伐名将2人；当代同样人才辈出，从老院子走出不少知名学者。

历史上，湘西地处偏僻，经济落后，文化也不发达，为什么老院子能成为这么辉煌的人才库呢？一位社会学家分析说：“老院子的人才之所以能够跳出地域、跨过时空、延续辈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关键的，那就是‘崇文、重教、尊德’的家庭经营理念。”

中国科学院院士**田奇璈**，正是从老院子中走出来的又一位杰出代表。

从书香子弟到学部委员

田奇璈字季瑜，土家族人，1899年生于湖南省张家界

市永定区（原大庸县）。

田奇璈的曾祖父田昌典是清朝翰林院学士，祖父田枬秩、父亲田运厚均是清朝进士，母亲为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田奇璈在弟兄五人中排第四，7岁入私塾，10岁时进大庸县城松梁书院上小学。辛亥革命后，受科学和民主启蒙运动的影响，田奇璈萌生了科学救国的理想。1912年，田奇璈13岁，离开家乡来到长沙求学。

1917年，他以优异成绩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1919年转入地质系本科，受教于王烈、何杰等著名教授。何杰的普通地质学，深入浅出，十分生动明快，激起了他和同学对地质学的极大学习兴趣。胡适的哲学课、陶孟和的社会学课、王星拱的科学概论课，大大扩展了他们的知识，拓宽了他观察世界的视野。

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田奇璈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5月5日，他参加街头宣传，被捕入狱10多天，后在各方爱国进步力量帮助下，



1966年10月，田奇隽（前排右5）、黄汲清（前排右4）、李春昱（前排右3）、董寅民（前排右1）等赴青海参加花柳岩讨论会

胜利返回学校。

1920年，有两位著名地质学大师来该系任教，一位是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取得地质学硕士学位、谢绝外国人高薪聘请而坚决回到祖国的李四光，一位是美籍著名地史古生物学大师葛利普教授。李四光讲授岩石学、矿物学，葛利普讲授古生物学、地史学、欧美地层比较学。田奇隽受影响，兴趣盎然，更加勤奋，连续3年以优异成绩获湖南省教育厅颁发的奖学金，而这个奖学金每年只有两个名额。

这份荣誉来之不易。大商人都认为田家

富甲一方，可实际上到了田奇隽这一辈，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家里根本无力承担他的求学费用，田奇隽只好一边打工赚钱，一边挤出时间刻苦学习。他去商务印书馆做校对、兼任贫民子弟学校的老师、到地质研究所做临时工、晒图员、打字员、勤杂工、磨片工他都干过。

1922年冬，田奇隽与同班同学一起去北京昌平周口进行毕业实习。他们用了3个星期，绘制了地形图和地层剖面，采集了化石和岩石标本，最后完成了毕业论文《周口冀且系之地层层序和古生物》。1923年初，在

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年会上宣读，受到导师和代表的赞扬。

1923年秋，田奇隽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考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实习员，次年升调查员。在调查所工作的3年里，他主要参加北方煤田地质调查及石炭二叠纪化石的研究，还参与了大型工具书《地质矿物学大辞典》的校订工作。

1927年3月，湖南省地质调查所成立，经翁文灏推荐，田奇隽回家乡湖南省工作，历任调查主任、技正、主任技正、代所长、所长等职。其间，他还曾兼任实业部（经济部）

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特约研究员，以及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但他始终没有离开湖南地质调查所。在战火不断、极度困难的战争年代，湖南省地质调查所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蓬勃，硕果累累，成为当时中国地质调查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他身先士卒，奔波野外，积极开展基础地质，特别是古生物学和生物地层学的研究，对湖南省区域地质、矿产地质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

1950年，新中国急需地质人才。在地质界深孚众望的田奇璈被调往武汉，任中南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资源勘测处处长、中南地质调查所所长，工作重心面向整个中南区。同年，他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组专门委员、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1952年，地质部成立，田奇璈任地质部中南地质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1955年，田奇璈被调往北京，在地质部开始参与全国地质科学技术的管理、组织与领导工作。他卓越的才华有了更宽阔的施展舞台。

“田泥盆”和“田湖南”

从进入地质调查所的1923年到1938年这16年间，田奇璈对我国海百合、头足类、腕足类化石进行了系统研究，陆续将研究成果凝练提升出版3部专著，奠定了我国对上述3类化石研究的基础。其中，《中国北部太原系海百合化石》是对该门类古生物的创新性著述。他对湘中石炭系、二叠系地层做了详细划分，初步建立了湘中上古生界的地层系统。1931年发表《湖南中部之丰宁系》一文，阐述湘中下石炭统统丰宁系的划分；1936年发表《中国之丰宁纪》，对中国丰宁纪（早石炭世）生物



1954年，田奇璈（左4）在匈牙利大学讲学期间与中外专家在一起



1967年，田奇璈（右4）在越南考察

地质学研究做了系统总结。

他对湖南泥盆系及其化石研究最为深入而系统，由他创建的“余田桥系”等12个地层名称，沿用至今。他重视湖南地层古生物研究，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最著名的《湖南泥盆纪之腕足类》一书，对腕足类化石之研究不局限于外形，还从磨制切面观察剖析了其内部构造，对石燕类化石之研究，也将壳表装饰进行了绘图，还以坐标图来表示其数量关系，达到了很高水平。他的这些研究奠定了我国（尤其是南方）泥盆纪生物学研究之基础。

在区域地质和地层古生物学研究基础上，田奇璜还从事构造地质、区域地质发展史方面的综合性研究，1936年发表了《湖南的造山运动》，1943年发表了《湖南煤矿与古地理》，1948年发表了《湖南雪峰地轴与古生代海侵的关系》，显示了他在地质学多方面的学术造诣。



1960年，田奇璜（中）在匈牙利考察

1938年他发表了《中国之泥盆纪》专论，对全国泥盆纪地层的分布、分类及泥盆纪古地理做了系统的总结，该书和另一部专著《湖南泥盆纪之腕足类》（英文版，1938），奠定了我国南方泥盆纪生物地层学的基础。正因为田奇璜对湖南省区域地质的深入研究以及对泥盆纪生物地层学的贡献，人们亲切地叫他“田泥盆”和“田湖南”。

1956年，他应邀赴苏联参加远东地质会议，做《中国震旦系》的报告，深为苏联地质界所重视。

为国家矿山建设严把地质关

田奇璜在我国大地构造和区域地质发展史方面的研究也颇有建树。

1936年，他发表了《湖南的造山运动》一文，提出湖南有加里东运动、湖南运动、燕山运动、衡阳运动等，勾勒出湖南大地构

造发展史的轮廓。

20世纪20~50年代，他在湖南省地质调查所工作期间，开展了湖南省铅锌、锰、铜、汞、煤、铁等大量富有经济效益和实用价值的矿产资源调查，在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基础上，指导并主持编制了湖南省铁矿、锰矿、铜矿的矿产志。参与了粤汉铁路株洲至宜章段沿线附近1:50万区域地质调查和矿产调查工作，其成果对粤汉铁路段沿线的工业布局起了重要作用。1952~1955年，他对中南地区地质矿产勘查及其科研工作规划、部署与实施进行了全面指导。他曾多次去大冶铁矿，研究、规划矿区及其外围地质勘查工作，为武汉解决铁、锰及其他有关矿产资源问题。

1955~1975年，田奇璜致力于全国矿产储量报告的审查和地质工作的管理、组织与领导工作。先后主持和参与制定了数十种地质矿产勘探规范，审批全国地质系



1960年，田奇璜（前排左1）与彭致敏（前排右1）在匈牙利考察期间与外国专家在一起

统及各工业部门提交的中型与大型燃料矿产、金属与非金属矿产地质储量勘探报告，为国家矿山建设严把地质资料质量关。他曾参与重大地质工作方针、规划、任务的制定和地质技术问题的研讨，经常深入基层检查、指导工作，以保证地质勘探工作的质量。

田奇璈积极参加学术界的社交活动。早在1920年，上大学时，他就与同学们一道积极筹办成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他几十年热心会务，历任学会《地质论评》编辑、《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版）编辑、《地质学报》编委、学会理事、学会编辑委员会委员。

不爱留洋爱中国

出身名门望族，但田奇璈没有一点风流雅士的派头，更像个土里土气的技术员，他把一生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片热爱的土地。

田奇璈曾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周总理称赞他为“土生土长的洋专家”。周总理为什么这样称呼他呢？原来当时很多专家都是留洋回来的，田奇璈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没留过洋的地质学者之一。

这固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机会。田奇璈多次放弃别人趋之若鹜的留德、留美的良机。1923年，田奇璈获得北京大学学士学位，因为成绩优异，他获得享受“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德机会，田奇璈因为不舍得放弃一项重要的地质调查，同时也因为劳累得了肺结核，他放弃留学名额，安心留在北京地质研究所工作。

后来，他又放弃了湖南省建设厅出留留学美国的机会。当时，被推荐留学名单上报后，同事见田奇璈不在家，都以为他出国了。其实，他正背着地质包裹登在崇山峻岭之间，潜心于野外地质考察和研究。田奇璈认为出



1965年10月，4位院士在黄山参加花岗岩讨论会期间合影（左起：田奇璈、孙宜钟、谢家荣、黄汲清）



田奇璈（左）与王德升（右）合影



1900年，田奇璈（右）与夫人头栉仙（左）在北京留影

国留学不是丰富知识、增长才干的一帆风顺，中国幅员辽阔，地质现象多样，有数不尽的矿产资源等着开发、研究，因此他宁愿坚守在这片地表荒凉、地下内蕴丰富的土地上，在野外实践中增长才干。

1956年，苏联记者采访田奇璈：“贵国有名望的老专家都是从西方留学回国的，请问您到哪个国家留过学？毕业于哪个学府？”田奇璈坦然答道：“本人从未出过国留过学，毕业于北京大学，一生都在中国做地质矿产研究工作。”后来苏联报纸这样介绍：“他是中国自己造就的第一代地质学家，他有五分之二世纪的地质实践经验。”对于苏联人来说，这是五分之二世纪；对于田奇璈来说，就准许一辈子的诺言。

1935年的一天，田奇璈从野外归来，妻子看到他肩上扛着一个手提箱，赶紧帮忙卸

下来，谁知行李箱太沉，没等移到方凳上就重重地摔在地上。妻子好奇地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把手箱打开，从里面捧出一个又一个的纸包和布包，以为是什么贵重物品，等打开这些包一看，原来竟是各种各样的石头！

妻子不禁嗔怪，皮箱可不是用来装石头的！田奇璈笑着回答：“多亏了这个皮箱，这些化石和标本才没有在颠簸和挤压中破碎。”田奇璈在野外调查时，曾经历过抢劫，钱财、手表等都被抢走了，但装着化石的行李箱完好无损。对于劫匪，这些石头一文不值；对于田奇璈，却是真正的宝贝：“命去点钱财，无关紧要。只要标本和资料不丢失，人身平安，这就是大吉大利。”

箱子里装的石头，甚至比家人还重要。抗战后期，有一次日军遣军到距他家仅数十里的地方，局势十分危急。他接到家人电报，要他速归，带领家中老小去外地避难，但他回电要全家自行向大南方向转移，他本人仍坚持在野外工作，不肯中止原有计划。

1940年，田奇璈获得我国首届地质学界最高奖“丁文江先生纪念奖”，以表彰他这种永不放弃、执着事业的精神。也正因为田奇璈不顾一切的长期努力，对日益密切的研究终于日益完善，他才得到那个亲切的称号——“田尼盆”。

为了地质工作，田奇璈全身心投入。他待人谦和诚恳，从不会争取个人的利益和地位，平时少语寡言，但只要牵扯到地质事业，他就滔滔不绝。1951年，中南地质调查所成立，田奇璈任所长。1952年，中南地质调查所撤销，改成立中南地质局，正局长却没有理顺成业地给田奇璈，反而是让只谈过师范的朱效成担任。很多人都为田奇璈鸣不平，他却无所谓，还和妻子夸奖朱效成认真负责，说和这样的一把手

共事十分满意。正副两个局长互敬互帮，合作共事，成就一段佳话。朱效成也经常到田奇璈的办公室请教专业，后来他也成为一个自学成才的地质专家。

田奇璈的一生获得荣誉无数，1934年获得第三届“纪念赵亚曾先生研究补助金”；1940年获首届“丁文江先生纪念奖”；1949年应邀参加了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开国大典观礼；1956年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地质部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1957年他奉派赴越南主持格矿勘探工作，1963年因此获越南政府颁发的友谊章。

田奇璈卓有声誉，却始终淡泊名利，心里最挂念的只有地质二字。晚年仍不顾年老体弱，坚持深入野外第一线，经常在崇山峻岭、悬崖深谷间跋涉。对他来说，星期日与工作日一样，机关和家里一样。

然而，青年困苦让他的体质偏弱，过度劳累让他的身体透支，再加上“文革”时期身体遭受迫害，1975年9月15日，76岁的田奇璈不幸离世，再也不能继续他热爱的地质工作。

2004年3月10日，田奇璈先生诞辰105周年纪念会在张家界举行，百余位科技界人士和田奇璈院士家属齐聚一堂。田奇璈院士的儿子田开玺先生含泪回忆了父亲热爱科学献身地质事业的不平凡的一生，总结父亲献身地质事业的“三不怕精神”：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三不怕烦。“三不怕精神”正是田奇璈一生最生动的写照。

他是土生土长的洋专家，他的一些都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就给了这片心爱的土地。